

现代自我的诉求:中国现代自传 发展述要(1919 - 1937)

梁庆标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南昌 江西 330022)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特别是自传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个体解放、自我表现的欲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代自传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尤其在 1930 年代前后达到高潮。此期自传的面貌和品格发生的显著变化,代表着中国自传的渐趋成熟,也体现了现代中国人自我意识的鲜明特征与时代的变迁。现代自传的这一勃兴,构成了中国自传史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景观。

关键词:中国现代自传;自我意识;现代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579(2012)03 - 0084 - 06

The Self Appeal: A Brief Survey of Modern Chinese Autobiography (1919 - 1937)

LIANG Qingb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wide spread of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urrents, especially of autobiography, greatly stimulated the Chinese desire for self - emancipation and self - expression. After a preparing period of several decades, the first golden period of modern Chinese autobiography came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And it reached the climax in the 1930s, and the qualit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revealing the gradually achieved maturity of modern Chinese autobiography,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change of the time of modern Chinese people's self - consciousness.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autobiography constitutes the important landscape of China's autobi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autobiography; self - consciousness; modern personality

“传记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记录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人性的发展。”^{[1][p1]}这是对传记本性的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认识。自传则是个体的人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纪念的重要方式和产物,古今中西皆同此理,自传写作因此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过,由于文化观念、宗教思想、历史境遇、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差异,中西自传在文体类型、叙述话语、价值取向、个性表现、思想理念等方面都

收稿日期:2011 - 12 - 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13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自传理论与批评研究”(11CWW018)。

作者简介:梁庆标(1978 -),男,山东郓城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记文学。

呈现出较大的差别,其发展也显得很不平衡。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自传,影响了中世纪大量宗教忏悔自传的出现。此后西方的自传传统逐渐加强,经过了文艺复兴前后的发展,到18世纪出现了以卢梭、歌德、富兰克林的自传为代表的现代自传的高潮。20世纪以来,自传这种文体更是长盛不衰,成为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士自我认识和自我记录的最普遍形式。^{[2] [p3-5]}

中国的自传大致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此后历代也产生了不少可归入广义自传范畴的自我写作,汉魏六朝、唐及晚明是比较集中的时期。除了少数直接以自传命名的作品外,还有数量庞大的自纪、序跋、日记、书信、自述诗、自撰年谱、自为墓志铭等。^{[3] [p1]}不过,总体看来,中国传统自传更多地受到史传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自传者的个体意识不够鲜明,类型化、社会化色彩比较明显。

中国现代自传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尤其在1930年代前后达到了高潮。中国现代自传的兴盛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尤其与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特别是自传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在对自我表现方面的影响来说,中国人对西方自传的认识和接受在其中起了最为直接的作用。在此影响下,中国现代自传的面貌和品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代表着自传的渐趋成熟,也体现了现代中国人自我意识的鲜明特征与时代变迁。现代自传的勃兴,构成了中国自传史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

—

从历史和文化的主体——人——的角度看,“社会和世界的最根本变化开始于对个体意识的探索”。^{[4] [p19]}自传就是这种意识变化的直接表达方式。自传写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却并不是“某一生命或自我的简单记录”,而是“处于历史中的自我与身份的一种协合”。^{[5] [p12]}有人甚至认为,在现代中国,“自传写作就是一种政治行为”。^{[4] [p150]}现代自传者都是在这种中西文化、思想的交融冲突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建构的,在风云激荡的特殊时代,它一开始就带有了复杂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复杂的特征与多元的格局。

“自传作为一种形式,为现代个体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完成提供了表达的渠道。”^{[4] [p9]}1920年代,中国现代自传应时而生,在随后的二十年左右达到了一个高峰。早在1930年代后期,郭登峰就已指出,自传写作在当时已成了时髦的事件:

“自叙传”是现今文坛上最时髦的作品!除翻译的以外,创作的自叙传,有写成专书的,有单篇独立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显然地是……一种新的浪花。^{[3] [p314]}

显然郭登峰将西方自传的译介与中国的大量自传写作共同置于自传的兴盛这一局面之下,这一自传风潮也构成了他编辑、出版和研究自传的动因。教育家古梅受黄炎培的鼓动,写了一部自传,在前言中她提到作传的动机,其一就是1934年自传的“风行”。^{[6] [p4]}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其状况正如杨正润先生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文学作品大量引进,个性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在卢梭等人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自传。”^{[1] [p617]}在《传记百科全书》中,作者梳理了中国自传的现代发展状况后也写到:“在中国,现代自传/传记的出现应当归功于被1898年‘百日维新’唤醒的知识界启蒙运动。”这时,自传被当作民族改良的工具被广泛介绍进来,在“五四”之后掀起了热潮,“西方传记的引入激发了以西方模式来写作中国自传、日记、回忆录的兴趣”,并“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一个文化高峰”,^{[7] [p208-209]}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自传作品。

应当看到,现代自传之所以在30年代前后进入高潮,与当时文化环境的变迁、自传者的处境和心态有一定的关系。在1925年之后,尤其是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以及国共分裂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浪潮和高扬的启蒙精神基本陷入低潮,一度满腔热情的知识分子大多复归于平静,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与总结,也就是说从创造的时代转入了总结的时代。年龄的增长(这时的自传者大多是在35-45岁左右)和丰富的阅历使得知识分子变得更加成熟了,注意到了自身的真实处境与能力,并试图从个人的角度认识社会与历史(如郭沫若、胡适)。国民政府在思想、言论上日益严密的限制也是他们转向自身的个人

生活,以回避与当局的正面冲突的一个因素,而描写自己则被认为是最为安全的。除此之外,生计问题的压力迫使更多的人出卖自己的隐私,这也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如许钦文、白薇、郭沫若等)。

综合考察“五四”到抗日战争爆发前(1919-1937)的自传写作,其特点可概括为:

一是自传的大量涌现,出现了“自传热”,其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自传热潮;

二是自传在形式上的现代转型,出现部分较成熟的自传作品;

三是自传作者身份的广泛性与多元性,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反映了自传意识的广泛觉醒和观念的更新;

四是自传思想和内容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意识的复杂化和多向度表现。自我、个性、个体主义,以及它们与相应的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个体的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纠葛,成为自传的焦点。

当然,与西方的经典自传相比,中国自传在很多方面还显得幼稚,由此大家对它的评价亦比较谨慎。同时,由于自传写作及研究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边缘地位,也导致目前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但鉴于其独特的表现和价值,本文试图对此做出梳理。

二

直接以“自传”或“自述”命名,是当时自传写作盛行的重要标示。其中有作者个人自觉单独写作或出版自传,如胡适《四十自述》、郭沫若大部头的《沫若自传》、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钱基博《自传》、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罗振玉《雪堂自述》、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王锡彤《抑斋自述》等,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关切,以及对自传这一文类的倾心。《宇宙风》、《良友》等杂志也形成了名人意识,特别邀请一批名人发表一系列短篇自传,如鲁迅、梁漱溟、洪深、徐悲鸿、柳亚子、蔡元培、丰子恺等,在推动自传发展的同时促动了人的个体意识。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自传丛书”,其中包括《从文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女兵自传》、《巴金自传》、《资平自传》等数种名家自传,将自传之风推向了高潮。

当然,受传统的影响,直接以自传、自述命名的作品还在少数,而回忆录、游记等文体更适合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著作更为丰富。回忆录如朱谦之《回忆》、邹韬奋《经历》、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刘大白《三儿苦学记》、李季《我的生平》、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陈公博《寒风集》等。游记方面如瞿秋白《饿乡记程》与《赤都心史》、邹韬奋《萍踪忆语》与《萍踪寄语》、徐仲年《海外十年》、朱自清《欧游杂记》与《伦敦杂记》、沙鸥《欧行观感录》、张若谷《游欧猎奇印象》、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应懿凝《欧游日记》、叶夏生《西行逐日记》等等,数量非常庞大。

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日记、书信这类更加私人化的传统自传形式也出现了勃兴,虽然大量文本尚未整理发掘,但是从当时公开出版的,以及现代整理出版的作品来看,亦不在少数。生前出版自己的日记,在古人几乎不能想象,但是郁达夫《日记九种》、田汉《蔷薇日记》、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章衣萍《倚枕日记》、吴曙天《恋爱日记三种》就敢于冒此不韪,将自己私人生活公开。现在整理出版的日记则更多,影响亦不小,如《胡适日记》、《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钱玄同日记》、《朱自清日记》、《蒲风日记》、《柔石日记》、《聂耳日记》、《吴虞日记》、《黄侃日记》、《蒋介石日记》、《郑孝胥日记》、《白坚武日记》、《唐纵日记》等。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各界包括底层人士的日记,也颇值得关注,如蔡文星《衔微日记》、杨文安《中学生日记》、陈素芬《陈素芬的日记》、雪映《女明星日记》等。书信有公私两种,功能不同。而私人书信的公开出版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尤其是情书集的涌现,为这类自传增添了无穷魅力。鲁迅和景宋的《两地书》,白薇和杨骚的《昨夜》,蒋光慈和宋若瑜的《纪念碑》,舒新城和刘济群的《十年书》,曹雪松和吴克茵的《雪茵情书》,章衣萍和吴曙天的《看月楼书信》,庐隐与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徐志摩的《爱眉小札》,金淑姿的《信》等,大多感情浓烈,热情奔放,体现了他们对爱情的真切追求与坦率表达,形成了一时风潮。另外还有后来面世的系列情书,如朱湘《海外寄霓君》、沈从文《湘行书简》、闻一多情书、朱自清致陈竹隐情书等,更以其私密性足堪引人注目。亲

朋友人来往书信则如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三人相互坦诚的《三叶集》,以及胡适、鲁迅、冯至、钱玄同、顾随、刘大白等人的书信,大多直白坦率,个人性格历历尽现,但是由于对象的不同,书信或庄或谐,或显或隐,体现出自我的不同侧面。

年谱一度兴盛于明清,在这一时期,自撰年谱作为最传统的自传形式依然存在,而且发生了现代的转化,虽然成就较少,但也有可观的表现。如章太炎《太炎先生自编年谱》、柳亚子《自编年谱》、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吴芳吉《自编年谱》等。据来新夏研究,尚有很多年谱存于全国各个图书馆或属于私人收藏,未经整理发表,因此难以概观,不过,其自传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序跋、口述历史、自传体小说、自传诗歌等文体也都是自我表达的重要形式,而且也出现了重要的文本,如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赛金花《赛金花自述》、毛泽东《毛泽东自传》、白薇《悲剧生涯》、苏雪林《棘心》,以及吴宓、闻一多等人的自述诗,其自我表达或强烈直露,或隐晦曲折,折射出个体自我的复杂心境。

自传的盛行也引发了自传选集热,一些出版社开始关注自传文本,收集古今自传结集出版,其目的—在对自传的整理,二在选择自传写作的范本以利读者的学习,三在制造名人效应,足以见出当时大家对自传的关注程度。影响较大的如《历代自叙传文钞》、《现代女作家自传选》、《名家日记》、《现代日记选》、《模范日记文选》、《日记文学丛选》(文言卷和语体卷)、《现代女作家日记选》、《中国大学生日记》、《现代书信选》、《现代女作家书信选》、《现代情书》、《日记与游记》等等。除了知识分子和官员等上层人士的自传,社会底层人士的自传也不容忽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一个横断面的记录,涉及各个阶层,拓展了自传的广度,但这种现象非常少见。

古人做自传者,不外几种身份:文人、学者、官员及僧侣。受教育、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自传观念的制约,自传写作不能普及,普通人的自传写作明显匮乏,流传于世者无几,而女性做自传者更是罕见。及至现代,这种局面得以改观。从自传作者的身份看,显然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国家元首、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而文人、学者、商界、艺术界诸成功人士等社会中坚阶层则是自传写作的最有力实践者。就自传的文学性、经典性而言,各类自传优劣自现。但是就自传最本质的意义和功能,即自我认识与发现、自我记录与表现来看,最具有文学色彩的自传和最平实的自传价值等同,都是人格的不同体现,并无高低之分。由此看来,自传的社会普及和响应,确实是一件盛事。我们还必须看到,虽然自传在社会各阶层得以普及,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仍然缺乏写作自传的文化素养和自信,写作并存的自传文本极为缺乏,从他们留下的少数自传、日记、书信等文字中可以看到,这大致都是生活的简单记录,几乎没有对个体追求、个人独特人格的描述,他们被湮没在历史的深处,难以复现,这大概正是中国历史的写照。

三

庞大的数量是自传走向成熟的基础。在现代自传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自传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了现代色彩。“抛弃文言采用白话,这是自传进入现代形态的一个标志。”^{[8] (p12)}汪荣祖分析中国史传传统时,指出了它的简要特征“一曰省字,二曰省句。”史传的写作如此,在其他作品的运用上亦同。文言的简练特点限制了人感情的抒发,往往追求凝练而不是感情的铺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功绩就是推广白话文的使用,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语体,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白话文以其通俗、流畅的特点大获人心。当然,并非所有的自传都是白话,白话和文言并存,甚至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同时存在。一般来讲,日记、年谱、书信、序跋等传统形式保存的文言成分较多,追求实用和简洁的效果,而典型自传和回忆录、游记等形式则更多地使用白话,它们侧重的是叙事和抒情。这正反映了两种语体的不同风格和功用。

第一人称的广泛使用也是自传成熟和盛行的重要表现。“我”、“吾”、“予”、“余”、“自”等词,在古

代都可指称自己,但更具个人色彩的直接指称“我”的使用比较少见。一般指称自己时,古人常会用自己的名或字来代替,而不直接称“我”,这是一种谦逊的说法。其实反映的正是自我意识的缺乏,对社会规范、习俗的顺从,不刻意突出自己,力图把自己放到一个客观的位置,以局外人的眼光加以审视。如《太史公自序》称自己为“太史公”。然而“自”的运用却较多,如自序、自撰、自为等,这应当是曲折的自我表达途径。现代自传则与之迥异,“我”随处可见,足以见出自我关注和表达的强烈心态。

相对于西方的长篇自传,中国古代自传的篇幅之短为世人公认(日记除外),其缺陷也毕露无遗。胡适对此有过批评,陈兰村也指出,古代自传“篇幅短小,几无长篇,容量有限。古代自传一般在一二千字左右,最短的只二三百字,万字以上的篇幅极少。法显的《法显传》有1万字以上。”^{[9][p12]}明代汪价的《自述》也只有9000字左右。沈复的《浮生六记》有3万5千多字,不过基本还是属于笔记体。李秀成自述约有5万字左右,但是仅存3万多字,“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罕见的长篇自传”。到了现代,这一局面得以大大改观。即使撇开大量大部头的日记、书信、游记,就正式自传而言,其长度也堪与西方自传媲美。其中,郭沫若长达百万字的《沫若自传》堪称代表,林语堂自传、胡适自传、郁达夫自传、巴金自传等,都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自传,基本上属于中长篇。中长篇自传的出现,有利于故事的展开,细节化的描写以及人物的形象塑造。

现代自传也呈现了从记事到塑造人格及至对人格的解释的转化。这是自传一步一步走向文学化、内向(私密)化、心理化的过程。在“传记之两途”,即“史笔与诗才”的关系中,后者的成就和影响明显更大,代表了自传发展的现代趋势。确实有部分自传摆脱不了传统的约束,侧重外部事件,或者个人经历的琐细记载。如鲁迅备忘录式的日记和各类流水帐日记,周作人、钱玄同的日记等,都极为简洁;某些回忆录类自传多对外部事件的描写,如李季《我的生平》写社会转折和历史变革,多议论,基本上与个人情感无涉;大部分游记都是描写国外见闻,个人的好恶基本不会明白表述。相当一部分自传则侧重个人情绪和心理的描写,如郁达夫《日记九种》、谢冰莹《女兵日记》、朱谦之《回忆》、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其强烈的感情倾向即使在西方自传中也属典型。当然大部分自传还是将叙事和抒情合为一体,通过对经历的分析,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揭示自己的心理,解释自己的人格,如《从文自传》、《钦文自传》、《沫若自传》等,力图突出个体的自我认识与身份建构。可以看出,受西方文化观念(如宗教忏悔、精神分析、个性主义、自由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内省精神的潜在作用,自传的个人化色彩愈来愈浓,表现为描写由外到内的转向,由公开到私密的呈现,尤其是对于传统禁忌的性心理、性活动的暴露,反映出自我袒露的大胆和直白。郁达夫首当其冲(郁达夫更接近卢梭,其袒露程度不相上下),胡适有谨慎的表现(他的坦白和蒙田相似,大部分是自己年轻时可爱的缺点,即使隐秘也无甚紧要),郭沫若更是对自己的轻佻表示忏悔,吴宓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与多位女性的情感纠葛,吴虞日记记述自己和妓女的关系,徐仲年坦白年少时的不良习惯给身体造成的危害,章衣萍写自己和妻子的性爱关系,吴芳吉反复记述自己的性意识,等等。上述现象在古人自传中都很少见。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传统思想的拘束,如面子观念、避讳思想、缺乏信仰等),中国人向来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忏悔意识和心理,即内向化的自我反省和罪责感,他们可以认错,但并不代表内心的忏悔,虽然有“三省吾身”、“面壁思过”的训诫,但是多数人对此依然淡漠。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和忏悔自传,中国现代文人、知识分子开始了自我反思和忏悔的精神自救,一旦形成习惯,对于中国人的人性和人格都有巨大的改变作用。较早一位从现代意义上使用“忏悔”一词的是记者黄远生,他的《忏悔录》(1915年)一文是对自己青年时期经历和个人思想矛盾的反思,之后使用这一词语和相近词语的,如郁达夫《忏余集》、巴金《生之忏悔》、徐志摩《自剖文集》、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等,在二三十年代自我忏悔成了一时风潮,并促动了自传的繁盛。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真正的忏悔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而且并不彻底,它经过了短暂的发展,在抗战发生后基本上复归于平静。

现代自传的趋向成熟还表现在自传理念的革新上。传统自传者很少直接论及对自传的态度,更不要说什么理论见解,即使有只言片语,也多是对自传的轻视甚至攻击(如刘知己的传记态度)。很少哪

个时期像这二十年那样,作家和学者赋予自传很高的重视,不遗余力地提倡并身体力行进行写作。他们介绍西方的自传/传记理论,对比中国的现状,提出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这方面,梁任公公开其先,胡适、郁达夫、朱东润、顾一樵、梁遇春等紧步其后,郭登峰、戴叔清等人亦大张旗鼓,宣传鼓动。其理论的中心观念在于对比西方传记,指出中国传记传统的缺失和不足,如塑造人物的类型化、忌讳太多、篇幅短小等,倡导学习西方加以补救。这种传记自觉导致了一股强烈的传记运动。但是从纯粹的自传/传记理论来看,他们很难说有什么推进和拓展,基本是对西方的学习和模仿,而且依然有很多限制,传统的力量依然强盛。

四

应当承认,人们对中国现代自传这一现象并非都是一致的肯定。郁达夫就曾对当时充斥着的各种以自我炫耀、自我美化为目的,从而不惜自我隐瞒、伪饰的自传写作进行过批评。作家老舍之所以没有顺应潮流写作正式的自传,其担忧也基本缘于这一因素。他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自传难写》(1934)中,表达了对当时自传中不良风气的不满与嘲讽,他说,“为留名千古,似应早早写下自传;自己不传,而等别人偏劳,谈何容易!”按照这样的心理,自传开篇就要写显赫的家世背景,即“依写传的惯例说,得略述五千年前的祖宗是纯粹‘国种’,然后详道上三辈的官衔、功德、与著作”。^{[10] 1456}然后写出世时的不同寻常,胸怀大志的求学时代,惊天动地的青春时代,如此等等,因为这一切他都缺乏,自传也就无法写作了,所以戏言下辈子要生在贵族之家,就可以大书特书了。他们所指责的自然是自传写作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本是自传难以避免的固有特点,即使卢梭的《忏悔录》也不能说完全避开了这些局限,从根本上看,这正表现了人自我认识的局限性。不过老舍等人的批评性认识,恰恰从反面验证了自传的繁盛状况以及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反响。

客观地说,虽然中国现代自传构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突出而极富研究价值的现象,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与其他文类研究的兴盛相比,自传研究依然处于边缘地位,成果不算丰富。从整体看来,现代自传写作依然没有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丰富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专门的论著更是少见,整体、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尤其缺乏从理论角度进行的观照。许多重要的问题,如西方自传对中国现代自传的影响、中国现代自传的品格与价值还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可以说,现代自传研究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西方自传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甚至已经进入后现代语境的情况下,中国现代自传研究颇需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 [1] 杨正润. 传记文学史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 [2] See Georg Misch. 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M]. trans. by E. W. Dickes. London: Routledge, 1950.
- [3] 郭登峰. 历代自叙传文钞[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4] Janet Ng.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Chinese Autobiography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 [5] Wang Ling-zhen. Personal Matters: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6] 古梅. 三十五年的回忆[M]. 无锡: 民生印书馆, 1935.
- [7] Margaretta Jolly ed. 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 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s[M].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 2001.
- [8] 杨正润. 中国自传: 现代性的发生[J]. 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2).
- [9] 陈兰村. 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 [10] 老舍. 老舍文集(第十四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张立荣)